

良好文化场域丛书

本书是重庆市2012年度教育规划项目“高等职业院校高技能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课题批准号: 2012-GX-206)的阶段性成果。



基础教育

名师职业幸福的文化场域研究

JICHU JIAOYU MINGSHI ZHIYE
XINGFU DE WENHUA CHANGYU YANJIU

刘会贵 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Http://press.swjtu.edu.cn](http://press.swjtu.edu.cn)

G635
27

| 良好文化场域丛书 |

基础教育

名师职业幸福的文化场域研究

JICHU JIAOYU MINGSHI ZHIYE
XINGFU DE WENHUA CHANGYU YANJIU

刘会贵 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 成 都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基础教育名师职业幸福的文化场域研究 /刘会贵著.
—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3.7
ISBN 978-7-5643-2432-2

I. ①基… II. ①刘… III. ①中小学—教师—现状—
研究—中国 IV. ①G635.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53070 号

基础教育名师职业幸福的文化场域研究

刘会贵 著

责任编辑	邹蕊
助理编辑	罗小红
封面设计	何东琳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交大路 146 号)
发行部电话	028-87600564 028-87600533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http://press.swjtu.edu.cn
印 刷	四川川印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85 mm × 260 mm
印 张	20
字 数	522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43-2432-2
定 价	49.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8-87600562

序

1. “场域”概念本是自然科学范畴

自然界客观存在引力场、电磁场、强相互作用场、弱相互作用场，置身其中，所有的物质都将受到影响，其运动状态和性质状态都将发生变化。

2. 人类社会的文化场域客观存在

人类社会之文化场域指人与人之间在相互碰撞和相互联系的过程中，通过文化力线发生作用的心理场域。文化场域也存在力，即文化场域通过文化力线对加入其中的人们形成文化影响力，不断地强化符合文化场域属性的行为，不断地矫正不符合文化场域属性的行为，通过物质利益改变着置身其中的人们，从而使其形成符合该文化场域属性的品性，强迫人们按照文化力线的轨迹运行，将“自然人”场化为“文化人”。依据文化力线的强度及其作用范围的大小，一个文化场域可以包括多个子文化场域，例如，中华文化场域包括的多个子文化场域有以山东省为核心的齐鲁文化场域，以陕西省为核心的三秦文化场域，以河北省为核心的燕赵文化场域，以四川省为核心的川蜀文化场域，以重庆市为核心的巴渝文化场域，以湖南省为核心的湖湘文化场域，以湖北省为核心的荆楚文化场域，以上海市为核心的海派文化场域，以广东省为核心的岭南文化场域，以西藏自治区为核心的康藏文化场域，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核心的西域文化场域，以内蒙古自治区为核心的游牧文化场域，以黑龙江省为核心的八旗文化场域，分布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华人聚居区的唐人街文化场域，等等。

3. 人民的幸福生活离不开一个良好的文化场域

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先后解决了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和封建主义与人民群众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新时期，不断地解决着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不断地实现着人民的幸福。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报告号召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我们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党的十七大报告重申：“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我们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勇敢担当起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然而，人民的幸福生活离不开一个良好的文化场域，换言之，人民只有生活在一个良好的文化场域中，才会生活得幸福。

4. 建构一个良好的文化场域

从文化介质的角度看，文化场域包括物质文化场域、制度文化场域和理念文化场域。一个良好的文化场域意味着它是良好的物质文化场域、良好的制度文化场域和良好的理念文化场域的一个交集。建构一个良好的文化场域必须从良好的物质文化场域、良好的制度文化场域和良好的理念文化场域三方面的建构着手。例如，治理“中国式过马路”应该从构建一个良好的文化场域着手：在物质文化场域方面，应该建立起方便的过街通道、完善的交通信号设施，让人们产生“这儿过街方便、没必要横穿车道”的心理认识；在制度文化场域方面，应该加强对《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宣传执行力度，让行人和非机动车驾乘者产生“为了过马路，没必要违法”的心理认识；在理念文化场域方面，应该加强对行人和非机动车驾乘者的教育力度，让行人和非机动车驾乘者产生“横穿马路，没有素质”的心理认识。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部分人过度功利化的今天，我们更应该充分发挥我国传统文化的优势，从加强理念文化场域建设的角度构筑一个良好的文化场域。

刘会贵

2013年5月3日

于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工程管理学院院长室

前言

《基础教育名师职业幸福的文化场域研究》是良好文化场域丛书的第二本，该书虽然关注教育、名师、幸福等主题，但是，其落脚点还在于从物质文化场域、制度文化场域和理念文化场域多角度入手建构一个良好文化场域。

《基础教育名师职业幸福的文化场域研究》构思于 2007 年。2005 年，钱学森向温家宝总理提出：“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钱老感慨道：“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自其被提出以来，“钱学森之问”就困扰着我国的许多有识之士。我本人也对“钱学森之问”充满了好奇，2007 年，我也从教育史的角度进行过一些思考，考证了我国权威文献《教育大辞典》认可的教育家的历史分布情况。假如在 1992 年版《教育大辞典·人物》和 1998 年版《教育大辞典·人物》（增订合编版）任一版本中出现的教育家都被认可，则中国教育家的详细历史分布情况为：中国古代教育家共有 221 人：先秦 6 人，秦汉 6 人，魏晋南北朝 21 人，隋唐五代 5 人，宋朝 45 人，元朝 20 人，明朝 59 人，清朝（鸦片战争前）59 人。中国近现代教育家共有 245 人。考证后我再进一步思考，“为什么我国教育家的历史分布会呈现出这样的状况——相对强盛的秦汉时期、隋唐时期很少出现教育家？”虽然该考证结果不一定准确地反映了我国教育家历史分布的细节，但是，历史趋势得到了反映。我初步的设想是，大师的诞生离不开教育家，而大师及教育家的诞生更离不开一个良好的文化场域。

2012 年，我成功申报了重庆市 2012 年度教育规划项目《高等职业技术学院高技能人才培养模式研究》（课题批准号：2012-GX-206），在研究过程中，我更进一步体会到，各类学校的健康发展、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包括名师在内的人的幸福等都离不开建构一个包括制度文化场域在内的良好文化场域。因此，我将已有的认识整理出版，作为重庆市 2012 年度教育规划项目《高等职业技术学院高技能人才培养模式研究》的成果之一。

本书的主要观点如下：

名师即教育情操高尚、教育思想先进、教育手段独到、教育业绩卓越、教育英名远扬的杰出教师。今天，名师已成为我国教育的第一资源。

幸福，从最一般的意义讲，指主体在其人生观的指导下对客体的舒适、健康和愉快的体验。幸福的三要素指主体，客体，主体对客体的舒适、健康和愉快的体验。无论西方文明还是东亚文明，其幸福思想大致分为两类：一类坚持感性快乐主义幸福观，一类坚持理性完善主义幸福观，宗教禁欲主义幸福观是理性完善主义幸福观的极端形式。

幸福的内涵涉及幸福观和幸福感两个概念。幸福观指主体关于幸福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在阶级社会，幸福观具有阶级性、时代性，主要包括个人主义幸福观和集体主义幸福观两类。幸福感指主体对客体给予自己的舒适、健康和愉快的感受状态，它是幸福的表现方式，其一般表现为沉静体验，高端表现为高峰体验，异化表现为约拿情结（Jonah Complex）。

幸福是每个人的终极追求，同时也是人生发展的条件。名师职业幸福指其育人理想得以实

现的舒畅心理体验，它源于对自己育人成就的愉快体验，具有精神性、创造性、给予性。

本书中被调查名师的总体平均幸福指数为 75.91，在 21~105 的取值范围中处于微弱的上等水平，但整体上也不高。

制约名师职业幸福的外因通过一定的媒介直接制约名师职业幸福指数的高低。通过因子分析发现：名师职业心境因素、身体健康因素、精力充足因素、职业满足（职业兴趣）因素、松弛与紧张因素、情感控制因素均与其职业幸福指数之间呈显著相关关系。

进一步分析发现：名师在职业心境方面的职业幸福感指数失分最多，失分率达 32.30%；第二为身体健康因素，其失分率为 31.63%；第三为精力充足因素，其失分率为 31.55%；第四为职业满足（职业兴趣）因素，其失分率为 29.60%；第五为松弛与紧张因素，其失分率为 24.04%；最后为情感控制因素，其失分率为 23.60%。六因素平均失分率为 27.71%。

值得注意的是，当面临各类问题时，名师主要求助于朋友、爱人和同事等非正式组织及其成员，而不求助于党、团、工会、政府机关等正式组织及其成员。

考虑到名师由普通教师发展而来，本书专门开展了名师与普通教师职业幸福的比较研究：名师的总体职业幸福指数为 75.91，而普通教师的为 68.48；名师的总体职业幸福指数处于上等的范围，而普通教师的处于中等范围，差异极其显著。在制约主体幸福感的 6 项因素方面，名师均优于普通教师。

鉴于国际教育大会 1939 年的第 16 号建议和 1953 年的第 37 号建议的共同观点都是中小学教师的工资、津贴、优惠、地位和保障等不低于同级官员，本书专门开展了名师与公务员处级干部职业幸福的比较研究：名师的总体职业幸福指数为 75.91，处级干部的为 65.00，名师的总体职业幸福指数处于上等范围，而处级干部的处于中等范围。名师的总体职业幸福感明显高于处级干部，差异极其显著。在 6 个职业幸福感因子中，名师与处级干部在精力充足、职业满足（职业兴趣）方面，差异不显著；在身体健康、职业心境、情感控制、松弛与紧张方面，差异极其显著，名师均超过处级干部。其中，名师在职业心境因素方面超过处级干部最多，其次为职业的松弛与紧张方面，再次为身体健康方面，最后为情感控制方面。

个人幸福的实现至少涉及个人的实践活动、个人的实践结果、由文化场域决定的个人幸福系数。因此，个人幸福的实现需要同时具备三个条件，条件一：活动本身自成目的；条件二：活动结果价值自足；条件三：拥有一个良好的文化场域。

从内因看，名师职业幸福的内部制约因素具体包括名师自身的“心”（心态）、“健”（健康）、“德”（道德）、“才”（才能）、“力”（努力）等要素。因此，名师进一步提高自己职业幸福水平的内部措施在于：不断更新自己的文化心态境界，有效提升自己的身心健康水平，切实增进自己的职业道德修养，用心涵养自己的专业技能素养，不断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作用。

基于名师职业幸福和职业不幸福首要因素的科学编码和频次统计，进一步提高我国基础教育名师职业幸福水平的外部措施在于：第一，放弃以学生（升学）考试成绩评价教师业绩的评价模式；第二，用心减轻名师的工作负担，让名师从过多的杂务和过多的考评中解脱出来；第三，切实改善名师的工作环境，尤其要给名师构建一个宽松的心理环境；第四，真正提高名师的职业待遇，其工资报酬和福利待遇水平应足够使他们同相应社会地位的官员或雇员持平；第五，从实际出发构建尊师重教的文化氛围，将“教师优先”予以落实，吸引并保留名师终生从事教师职业。

只有构筑可能的文化场域，才能实现我国基础教育名师可能的职业幸福。从广义讲，名师外在的文化场域由名师所处的宏观自然场域、中观社会场域和微观任务场域构成。名师所处的

宏观自然场域指名师可以触及的那部分自然界，自然场域的优劣会影响名师的职业幸福。名师所处的中观社会场域由名师所处的社会教育技术文化场域、社会经济文化场域、社会制度文化场域、社会心态文化场域构成。制约名师职业幸福之任务场域主要指名师所处学校的校园环境、校园文化、治学态度、激励制度，它是名师面临的微观因素和直接因素。名师的中观社会场域和微观任务场域主要通过“树结构”或“果结构”的教育体制来阻碍名师获得职业幸福或促进名师获得职业幸福。

为了有效提升名师的职业幸福水平，应以“名师良好的校园文化生态”、“名师健康休假与疗养”、“名师工作室”、“名师导师制”和“名师沙龙”为有效载体，分别从器物层面、制度层面、精神文化层面确保名师拥有职业顺境。针对过度功利主义的现实，我们需要一个出世的文化场域、一个彼岸的文化场域、一个无为的文化场域。

在本书的撰写和出版过程中，作者得到了导师——西南大学周鸿教授、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等的关心和支持，参考了许多专家和学者的著作和文章，在此一并致谢。由于本人学识有限，一些观点也仅是一家之言，本书的不足之处敬请各位专家、学者指正。

刘会贵

2013年5月20日

于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逸雅苑

目 录

第一章 引 论	1
一、基础教育名师职业幸福文化场域研究的缘起	1
二、文献综述	11
三、我国基础教育名师职业幸福文化场域研究的理论框架和方法	25
第二章 基础教育名师职业幸福文化场域的理论分析	28
一、基础教育名师的含义与标准	28
二、名师职业幸福的理论	36
第三章 基础教育名师职业幸福审视	91
一、基础教育名师职业幸福现状调查概述	91
二、名师职业幸福现状调查结果	104
三、名师职业幸福文化场域的主要问题	129
第四章 名师职业幸福的自主修炼	131
一、由培训需求调查表反映出来的名师素养	132
二、心态文化制约着名师的职业幸福	137
三、名师的职业幸福以自己身心健康为基础	156
四、名师的职业幸福以加强德性修养为前提	162
五、名师的职业幸福以提升才干为必要条件	170
六、名师的职业幸福在于不断奋发与拼搏	199
第五章 名师职业幸福外在文化场域建构	204
一、文化场域制约着名师的职业幸福	206
二、名师职业幸福的具体文化场域	212
三、给予名师职业顺境——支持性职业场域	252
四、建构名师支持性文化场域之可能载体	259
结 语	289
一、构筑名师职业幸福可能的文化场域	289
二、观点回顾	294
三、本书的不足与努力方向	296

参考文献297

附 录299

附录一 我国基础教育名师职业幸福现状问卷299

附录二 我国基础教育名师职业幸福现状访谈提纲305

附录三 我国基础教育名师培训需求调查问卷306

附录四 我国教育家的历史分布307

第一章 引 论

一、基础教育名师^①职业幸福文化场域研究的缘起

（一）基础教育名师职业幸福文化场域研究的背景

人类社会经历了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目前正向知识经济时代过渡。与此同时，人类栖居的地球也由大号“缩水”为中号并进而“缩水”为小号、微型。美国学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将地球“由大变小”的历程归纳为三个阶段^②：第一，1492—1800年，地球由大号“缩水”为中号；第二，1800—2000年，地球由中号“缩水”为小号；第三，2000年后，地球由小号“缩水”为微型。

在微型地球上，国际竞争空前激烈。非洲谚语说：“在非洲，瞪羚每天早上醒来时，它知道自己必须比跑得最快的狮子还快，否则就会被吃掉。狮子每天早上醒来时，它知道自己必须超过跑得最慢的瞪羚，否则就会被饿死。不管你是狮子还是瞪羚，当太阳升起时，你最好开始奔跑。”^③

由于缺乏各类杰出人才，我国的国际竞争力低下，华夏民族在世界上的生存和发展直到今天仍然处于不自由状态。

1. 知识经济时代，国家的发展在于不断创新

今天，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一个学习化的社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认为，人类的两项根本目标是“追求富有”和“实现自我”，今天，机器已经能够替每一个现代人做奴隶曾为雅典少数有钱人所做的事情，社会在不断创造物质财富，人类“追求富有的权利”已经变成了现实，“现在社会难道不应该把‘学习实现自我’，即人的教育，放在最优先的地位吗？”“一个社会既然赋予教育这样重要的地位和这样崇高的价值，那么这个社会就应该有一个它应有的名称——我们称之为‘学习化社会’。这样一个社会的出现，只能把它理解为一个教育与社会、政治与经济组织（包括家庭单位与公民生活）密切交织的过程。”“一个学习化社会将会在一个天气晴朗、组织完备、设备充足、闪闪发光的情况下出现于人间。”在学习化社会，教育既是保障专业活动、促进专业活动的动力，又是文化中的堡垒和推动力。“我们要在贫穷的限制中为个人求得幸福而准备财富。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里这也许是一种公正的道德。”^④

① 若无特别交代，“我国基础教育名师”在下文简称“基础教育名师”或“名师”。

② ③ [美]托马斯·弗里德曼·何帆，世界是平的[M]。肖莹莹，郝正非，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8-9，107。

④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学习化的社会：现在和未来[M]//陈桂生，赵志伟。现代教师读本：教育卷。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6：14-16。

学习化社会在本质上是以知识经济为主体经济形态的社会。刚兴起几十年的知识经济以知识为基础,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以虚拟经济为经济活动模式,以网络经济为经济运行方式,实行敏捷制造、柔性生产、“全面式”管理和全球化的开放式生产。知识经济远远优越于农业经济与工业经济,学习化社会在本质上以知识经济为基础。

知识经济时代,国家的发展在于不断创新。知识经济具有知识不断创新和高技术不断产业化的特征。当今世界,知识更新和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速度不断加快。人类在工业革命后的近 200 年间,第一个百年知识的总量大约是 50 年翻一番,而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人类知识以指数方式增加,最近 30 年人类新增知识的数量,已超过过去 2 000 年人类所积累知识的总和。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一个国家是否能够发展关键在于其是否能够不断创新。21 世纪,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取决于其能否成为一个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创新型国家。

2. 中国要成为创新型国家,关键在于教育

在人类社会的 21 世纪,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零和博弈、赢者通吃”的态势,社会财富日益向拥有知识和科技优势的国家 and 地区聚集,因此,教育的战略地位不断提升,“教育是知识创新、传播和应用的主要基地,也是培育创新精神和创新人才的重要摇篮。无论在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专业人才方面,还是在提高创新能力和提供知识创新、技术创新成果方面,教育都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①

弗里德曼也说,在 21 世纪这个“微型”而又平坦的地球上,“财富和权力将会越来越多地聚集到那些成功地完成了以下三个基本任务的国家、公司、个人、大学和群体手中:建设连接到这个平坦世界平台的基础设施;通过教育来获得更多能够在这平台上创新、在这平台下工作,以及成功接入这一平台的人才;最后,通过成功治理来从这一平台中获得最好的东西,并且防范最坏的副作用。”^②这三个基本任务的完成,本质上都是教育的完成。没有教育作基础,连接到这个平坦世界平台的基础设施无法很好地建成,自这个平台获得最好的东西并防范最坏的副作用也无法实现。

在“零和博弈、赢者通吃”的国际竞争态势下,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马太效应”更加明显。弗里德曼还说:“更多地方的更多人现在能够进入这个平坦世界的平台相互联系、竞争和合作,不幸的是,也前所未有地相互毁灭。”^③面对这么一个生死的竞技场,中华民族实乃面临巨大的挑战。

中国今天面临的挑战集中表现为国际竞争力低下。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国际竞争力位列世界第 23 位,而 2007 年列第 34 位,2008 年列第 30 位,2010 年列第 30 位,远远落后于竞争力排名靠前的经济体美国、瑞士、丹麦、瑞典、新加坡、芬兰、德国、荷兰、日本和加拿大^④。

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在于培养出占我国总人口 80% 的主要从事 Paperwork 的智力劳动者和成批的杰出专家人才。弗里德曼在论及日益本土化的跨国公司——在平坦世界上漂浮的企业何以服务自己的母国时说:“能将公司和其母国利益结合起来的唯一方式就是拥有真正聪明的国民,他们不仅可以在更大的全球蛋糕中获取属于自己的份额,而且还可以创造出新的份额。”^⑤关于我国的发展依赖于我国“真正聪明的国民”的情况,邓小平同志 1985 年说:“我们多次说

① 江泽民. 江泽民文选: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31.

② ③ ⑤ [美]托马斯·弗里德曼. 世界是平的[M]. 何帆,肖莹莹,郝正非,译.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159,159,188.

④ http://jjckb.xinhuanet.com/gjxw/2008-10/09/content_121631.htm, 2009-2-17.

过,我国的经济,到建国一百周年时,可能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我们这样说,根据之一,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完全有能力把教育搞上去,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培养出数以亿计的各级各类人才。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①中国要完成工业化、知识经济化的双重历史使命,而国外发达国家却只有一项历史使命,即由工业化过渡到知识经济化。中外双方的抗争不在一个级别,但历史又安排了这一对抗,我们没有别的出路,只有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迎接这一挑战。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在于我国必须培养出大批有文化、懂技术、富有智慧的劳动者。

在将我国 80%的人口培养为从事 Paperwork 的智力劳动者的同时,我国必须培养出成批的杰出专家人才。邓小平指出:“在人才的问题上,要特别强调一下,必须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和培养杰出的人才。”“革命事业需要一批杰出的革命家,科学事业同样需要一批杰出的科学家。我们工人阶级的杰出人才,是来自人民的,又是为人民服务的。在广泛的群众基础上,才能不断涌现出杰出人才。也只有有了成批的杰出人才,才能带动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我们要彻底清除‘四人帮’的流毒,把尽快地培养出一批具有世界第一流水平的科学技术专家,作为我们科学、教育战线的重要任务。”^②然而,现实是严峻的,我国今天极度缺乏杰出人才,我国今天难以培养出杰出人才。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丁钢说:“今天最为缺乏的是跨学科领衔型人才。要实现自主创新的,国家,必须要培养一批顶尖的、一流的、跨学科的领衔型人物。”^③孙君飞说:“我们大学里的创作课也是让‘坏诗人’变成‘好诗人’,我们的教育也是让‘坏孩子’变成‘好孩子’,最终出现的是‘好得很平庸’的一大群。”^④从孙君飞的话中,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今天的教育只能培养出“好得很平庸”的人,要培养“好得有棱角”的杰出人才是不可能的。更为直接的是“钱学森之问”,它拷问着包括教育工作者在内的我们每一个人。

我国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必须加快教育振兴的步伐。在以知识经济为主要经济形态的后现代,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最佳模式是 GNH 模式,即国民幸福总值最大化的模式。GNH 模式依赖于教育的振兴和发展。GNH 模式的发源地在不丹,GNH 模式的不丹标准包括经济增长、政府善治、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GNH 模式的实施依赖于教育的振兴和发展。第一,教育的振兴和发展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主要表现为“硬产业”和“软产业”的发展。“硬产业”即生产传统物质产品的产业,“软产业”即生产非物质文化产品的产业。教育的振兴和发展形成人力资本、知识资源和信息资源,再将人力资本、知识资源和信息资源投入“硬产业”和“软产业”,以绿色的、可再生、可持续的方式促进经济增长,造福于人们。第二,教育的振兴和发展可以达成政府善治。政府善治主要包括民主政治、信用政府、优质管理、乐于参政、保障充分和民心工程。而教育的振兴和发展可以启迪民智、发展民主,可以提高政府管理人员的素质,从而提高政府的信用水平,可以提高人们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政治参与能力。第三,教育的振兴和发展可以加快文化发展。教育的振兴和发展可以繁荣文化、传承文化、创新文化、保存文化,通过优质文化培育精神富有的真正幸福的人。第四,教育的振兴和发展可以实现环境保护。在农业文明时代,天人合一,而在工业时代,物我两分,人们一味征服自然,造成森林毁灭、土壤侵蚀、沙漠扩大、空气污染、气候异常、水体污染。而教育的振兴和发展可以教育人们保护环

① ②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21.

③ 丁钢,杰出人才培养:一个制度文化的分析视角[J].新华文摘,2010(14):111.

④ 孙君飞,不做“好得很平庸”的人[J].发现,2010(9):1.

境,可以恢复生态平衡,重建人类幸福家园。总之,我国必须切实推进科教兴国战略,加快教育振兴的步伐,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弗里德曼说,在21世纪平坦的全球化时代,“美国仍将胜出”,因为“美国的独特之处并不在于它拥有麻省理工学院,也不在于这所学校的毕业生带动了经济增长和创新,其独特之处是,美国的各个州都有像麻省理工这样的大学。‘美国有4000所大学,’国际教育协会的主席艾伦·E.古德曼(Allan E. Goodman)称,‘世界其他地方的高等学府加起来一共才有7768所。在加利福尼亚一个州就有大约130所大学。全球只有14个国家拥有比加州更多的大学。’”^①美国除了大学多外,与之相应,美国的名师名家也多,占尽国际先机。

我国可以从国外引进先进设备、技术和资金,但是引不进国民素质,只有加快教育振兴的步伐,才能培养出占我国总人口80%的主要从事Paperwork的智力劳动者和成批的杰出专家。就如前苏联早期领导人加里宁在回答“为什么要这样提高人民教师的地位”时所说,“为了要最终巩固政权并建成共产主义,就必须使人民拥有自己的知识分子,使人民成为有知识的人,必须消除智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性和一切区别。但究竟什么时候智力劳动才能同体力劳动没有区别呢?这只有我国所有的人即全体人民都成为有知识的,只有我们建成共产主义的时候,才有可能。把幅员广大、民族众多的苏联全体人民都造就成为有知识的人,这是最伟大的任务。”^②加里宁虽然没有生活在知识经济时代,但他在20世纪前期就能准确地把握到尊重教师、振兴教育与巩固政权、消除体脑差别、实现共产主义的内在联系,就能认识到用知识武装全苏联人民是国家最伟大的任务,这确实值得今天的中国人民钦佩与学习。早在1994年,江泽民同志就提出教育优先发展是我国的百年大计,他说:“在我们这样一个有近十二亿人口、资源相对不足、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依靠什么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呢?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条,就是把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真正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③同时,江泽民对一些地区和部门还没有把教育摆到应有的位置、坚持“经济要上,教育要让”、“先把经济搞上去,再来发展教育”,甚至挤占、挪用教育经费上经济项目、盖楼堂馆所和拖欠教师工资等错误做法进行了深刻地批评:“这些认识和做法,都是同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的要求不相符的,是缺乏远见的、有害的。”^④

3. 振兴教育的关键在于有一支名师队伍

江泽民说:“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高质量教育的一个基本条件。”^⑤由于各自主客观条件的不同,不同的教师,其德、能、勤、绩会呈现极大的差异。邓小平曾说:“毛泽东同志说过,一万年以后也会有先进和落后的差别。因此,我们在鼓励帮助每个人勤奋努力的同时,仍然不能不承认各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才能和品德的差异,并且按照这种差异给以区别对待,尽可能使每个人按不同的条件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总目标前进。”^⑥

我国今天的教育现状堪忧。许多专家学者对我国今天的教育现状堪忧发表过看法:《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我国教育值得担忧的是“教育观念相对落后,内容方法比较陈旧,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素质教育推进困难”等。樊亚奎有一个归

① [美]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M].何帆,肖莹莹,郝正非,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251.

② [苏]加里宁.在欢迎荣受勋章的乡村教师晚会上的讲演[C]//陈桂生,赵志伟.现代教师读本:教育卷.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6:314.

③ ④ ⑤ 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70,371,337.

⑥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95,96,106.

纳：“当今教育中不幸福的种种表现，分为知识的附庸、个性的泯灭、生命尊严的失落和人际关系的异化四个方面”，其产生的原因就是“唯智主义的影响、成人文化的桎梏、价值理性的丧失和消费文化的误导”^①。这进一步导致了更为严重的后果：第一，应试教育，学生素质差；第二，专业划分过细过窄；第三，教学内容偏旧；第四，教学方法偏死；第五，人文教育偏弱；第六，教育水平差异明显，导致严重的教育不公。这就使我们的教育偏离了“教育的四个支柱”，造成了我们的许多学生高分低能，他们既没有“学会认知”，又没有“学会做事”，既不能很好地“共同生活”，又不能很好地“生存”，不能很好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郎咸平评价说：“我们现在培养出来的很多学生‘产品’是只讲知识，既没文化也不懂做人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②为此，我们“对教育的各个阶段和领域应作重新思考，使其相互补充，相互渗透，从而使每个人在一生中能够充分利用范围不断扩大的教育环境。”^③可以说，在我国教育领域的这一系列值得担忧的现象都部分地缘于我国师资的严重差异和名优教师的不足。

若要造就高素质的国民，则必须要有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特别是要有一支高素质的基础教育的教师队伍。江泽民 2002 年 9 月 8 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建校 100 周年大会上说，我们“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适应我国教育发展需要的、开放灵活的教师教育体系，努力造就一支献身教育事业的高水平的教师队伍。”^④北京师范大学朱旭东教授的研究也表明，与班级规模、经费投入、教学材料等因素相比，教师质量与学生成就的关系更密切^⑤。

截止 2006 年，我国有幼儿教师 77.649 1 万名，小学教师 558.755 7 万名，初级中学教师 346.347 8 万名，高级中学教师 138.718 2 万名。据此统计，2006 年，我国共有中学、小学和幼儿教师 1 121.470 8 万名^⑥。如何提高这支队伍的整体素质？如何将其中尽可能多的成员培养成既懂学科专业又懂教育专业的教师？这是一个时代课题。邓小平早在 1958 年就说：“师资问题要注意。正规大学、中学现有的师资质量不能降低……有的国家中小学质量差，吃了亏。我们无论如何要保证有一批学生基础课学得好的，否则将来要吃大亏。”^⑦而 1978 年，我国改革开放开始之际，邓小平再次说：“最后，讲讲尊重教师的劳动，提高教师的质量问题……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的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键在教师。”^⑧的确，没有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我们是要吃大亏的。郎咸平也将我国培养出很多“低劣”学生的原因归咎于缺乏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他说：“首先我们内地的教授本身的这个操行就不是很得体，总是跟官场搅在一起，另外一个学术做假，还有就是到处去跑场子，根本不注重教学，这些都导致了学生这个‘产品’比较低劣。”“现在的大学，就是大楼。一个校园里，到处都是大楼……如果以硬件为标准的话，它们都可以排全世界第一的。剑桥大学跟它们根本没法比，剑桥里都是破楼，好几百年的破房子了。”^⑨我国仅有大楼而缺乏大师是不能培养出高素质学生的。

我国要造就一支高素质的基础教育教师队伍，“‘名师’示范，引领教育质量提升”是唯一的战略选择。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结构升级，必然排斥低素质教师，必然需求高素质教师。因此，应把区域教师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纳入到区域战略中统筹，即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

① 樊亚奎. 论教育的幸福维度[D]. 开封: 河南大学, 2003: 3-4.

② ⑨ 郎咸平. 郎咸平说: 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0: 88.

③ [法]雅克·德洛尔. 教育——财富蕴藏其中[M].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文科, 译.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6: 76-88.

④ 江泽民. 江泽民文选: 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501.

⑤ 刘维涛. 敢于担当教育使命[N]. 人民日报, 2007-11-23: 13.

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2007)[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北京数通电子出版社, 2008.

⑦ ⑧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282.

明确把区域教师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纳入其中。重庆市为了提高其基础教育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提出并实施了“‘名师’示范,引领教育质量提升”策略。为此,2007年10月公布的《重庆市普通中小学教师教育“十一五”规划》提出,重庆市在“十一五”期间要实施“重庆市名师梯队建设‘523’工程”,即到2010年,重庆市要培养、评选重庆市名师50名(含农村名师20名)、市级教育专家和学科带头人200名(含农村教师100名)、区(县)级学科带头人3000名(含农村教师2000名)^①。因此,培养名师,尤其是培养大批省市级、国家级高端名师并以此带动我国广大基础教育教师幸福成长成为我国在知识经济时代最急迫的课题。李岚清说:“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总要通过学校校长、学校领导班子和教师最终落实到学生身上。所以,要依靠广大校长、教师,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谈到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的措施时,李岚清又说:“在逐步提高教师学历层次时,开展以培训全体教师为目标、培训骨干教师为重点的继续教育,使中小学教师的整体素质不断提高。……许多地方政府多渠道筹资设立骨干教师专项资金,在大中小学培养了一批高水平的学科带头人和有较大影响的教书育人专家,建立了一支符合时代要求、发挥示范作用的骨干教师队伍。”^②可以说,“‘名师’示范,引领教育质量提升”是我国实施素质教育的很好的战略选择。

4. 我国基础教育目前缺乏一支数量充足的名师队伍

当代中国缺乏教育家,尤其缺乏基础教育领域的教育家。“当代中国到底有没有教育家?”人们对此争论已久,而今人们对此越来越关注,但却很难用“是”或“否”来回答。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与人类发展系主任陈洪捷教授认为,今天的教育体制已逐渐完善,这一方面使得教育有了一个比较完整规范的保障体系,另一方面也使得个人发挥的空间变小了,“个人英雄”式的教育家的成长就相对更困难了。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认为,我国目前确实缺乏一批既有系统的理论又能付诸实践的教育工作者^③。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张怀西2007年向大家提出了一个时代难题——我国应该“如何在市场经济和文化多样化环境下培养教育家”。^④

当代中国也缺乏基础教育名师。教育家在成为教育家之前,往往在一定范围内是知名度极高的优秀教师。我国今天愈演愈烈的“择校风”反映出的问题,实质就是我国今天缺乏足够数量的名师,“择学校”在本质上是“择名师”。温家宝在2003年庆祝第19个教师节时深情地说:“教育工作要坚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要办一流的学校,就要有一流的教师队伍,有一批出色的教育家。要像宣传劳动模范、宣传科学家那样宣传教育家、宣传优秀教师,在全社会形成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⑤

今天,我国有限的基础教育名师分布不均。经济发展的极度不平衡使得我国长期存在巨大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差异和巨大的东部、中部、西部社会差异,也使得城镇与乡村的基础教育、不同地域的基础教育呈现出极大差异。加之我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精英教育”遗留的重点中小学与非重点中小学的差异,并且这一差异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放大,造成今日公众抱怨最多的“择校难”、“择班难”、“读书难”。其本质在于我国今天缺乏基础教育名师、有限的基础教育名师分布不均。

①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重庆市名师梯队建设“523”工程[N]. 重庆日报, 2008-4-3(15).

② 李岚清. 李岚清教育访谈录[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3: 390-391.

③ 看世界·教育家杂志社. 我们今天需要怎样的教育家[J]. 看世界·教育家. 2007(3): 63.

④ 刘维涛. 敢于担当教育使命[N]. 人民日报, 2007-11-23(13).

⑤ 张彦春. 朱寅年. 16位教育家的智慧档案[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前言.

5. 包括名师在内的我国基础教育教师职业幸福现状不容乐观

2005 年, 美国《财富》杂志中文版对我国教师的幸福现状进行了调查: 我国教师工作感到累的比例和工作感到压力大的比例分别要占七成以上, 而对自己的工作拥有幸福感和对自我的发展拥有满意感的比例不到两成, 他们经常认为所在学校的管理制度与流程存在不合理之处, 对自身的发展前途缺乏信心, 对薪酬待遇不满意, 对工作环境和工作关系不满意等, 表现出工作混日子, 得过且过, 没有激情, 缺乏创造欲望, 仅仅满足于完成任务的“职业倦怠”状况, 因而, 由工作带来的幸福感偏低^①。据 2005 年 10 月 12 日《中国教育报》报道: 有 47.6% 的教师认为压力比较大, 34.6% 的教师认为压力非常大, 29% 的教师认为比较严重, 30% 的教师工作严重倦怠, 38.5% 的教师心理状况不太好^②。上海市松江区教师进修学院王洪明采用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指数量表对上海市某市郊和江西省某市郊的 322 名中小学教师 (其中, 男教师 128 人, 占 39.75%, 女教师 194 人, 占 60.25%; 小学教师 127 人, 占 39.44%, 初中教师 80 人, 占 24.84%, 高中教师 115 人, 占 35.72%, 基本符合两区教师的构成情况) 进行调查, 结论为, 市郊中小学教师幸福感水平也偏低, 并猜测该市郊中小学教师幸福感水平偏低可能与他们的生活满意度低有关^③。刘国艳对江苏省某市 4 所市属中、小学 (其中重点中、小学校各 1 所, 普通中、小学校各 1 所) 的 358 名教师的职业幸福状态作了抽样调查, 其统计结果见表 1。该表显示, 有 62.2% 的中学教师、55.1% 的小学教师不能从职业中感受到幸福, 其调查结论为“低落的教师幸福”^④。然而, 正是这“低落的教师幸福”制约了我国广大基础教育教师成长为名师。

表 1 江苏省 358 名基础教育教师的职业幸福状况表

	很幸福	幸福	一般	不幸福	很不幸福
中学教师	2.8%	35%	54%	5.5%	2.7%
小学教师	4.3%	40.6%	46.7%	6.3%	2.1%

资料来源: 刘国艳. 职业幸福: 教师专业发展的起点与归宿[J]. 辽宁教育研究, 2006 (8): 44.

(1) 我国基础教育教师低落的职业幸福现状, 其宏观原因是我国的许多地方自 1978 年到现在走了一条片面崇拜 GDP 的发展之路。

1978 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得以确立, 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逐渐明确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后, 社会焕发出经济建设的勃勃生机, GDP 成为许多人追逐的目标。

GDP 有不容忽视的价值。但是, 片面追求 GDP 则后患无穷。王北生教授认为^⑤, GDP 无法区分发展的质量高低, 无法估测发展的环境资源代价, 无法衡量人民幸福。关于发展质量, 他说: “以 1984 年为例, 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 11 000 美元, 而中东一些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 如阿联酋是 22 000 美元, 卡塔尔是 20 000 美元, 科威特是 17 000 美元, 但国际上并不将这些中东国家视为发达国家。”关于发展的环境资源代价, 他借用美国世界资源研究所高级经济学家罗伯特·雷佩斯的话——“一个国家可能耗尽它的矿产资

① 李宏伟. 对教师职业幸福感的思考[J]. 江苏教育研究, 2006 (5): 57.

② 资料源于《中国教育报》, 2005-10-12.

③ 王洪明. 市郊中小学教师幸福感调查[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06 (5): 509.

④ 刘国艳. 职业幸福: 教师专业发展的起点与归宿[J]. 辽宁教育研究, 2006 (8): 44.

⑤ 王北生, 王萍. 从 GDP 到 GNH: 当代教育功能的转向与整合[C]//陕西师范大学. 教育与幸福——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分会教育基本理论专业委员会第十一届学术年会论文集. 西安: 2007: 26-27.